

# 埋骨風城：現代佛教改革健將大醒法師

江燦騰

## 在新竹二年記事<sup>1</sup>（五）

（九）、輪到新僧大醒法師登場：簡述他是如何出色落實太虛大師佛教改革志業的？

之前各節，我們都在介紹新僧大醒法師如何在出家後，成為著名的佛教改革者太虛大師門下的一位表現卓越的「新僧」歷程、及其所面臨的「從太虛出家之初，一直延續到二十五歲的大醒法師本身，也開始出家為僧後」，這對師徒兩代之所以能有極大改革共識的時代氛圍（不論外在社會環境或內在佛教環境），所交雜構成之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因緣。

其目的不只是在介紹新僧大醒法師個人，而是藉以在解說其所承襲的傳統佛教現況，以及實質促成其作為改革健將的「太虛流新僧」的相關助緣之所在。

因他很快就追隨太虛大師去主持其他佛學院的教務，而他僅有的佛學院教育經驗，也就是只在「武昌佛學院」的第二期就讀兩年的歷練而已。

第三年（一九二七），他是前往南京金陵寺禁足一年，學習自己作為佛教僧侶的相關作為規矩與佛教知識。但到一九二八年春天，他就被太虛大師派到福建廈門南普陀寺擔任該寺的監院，並主持當時常常鬧學潮的「閩南佛學院」，前後五年，直到一九三二年冬季，才與太虛大師一起離開。

而後，有關「新僧大醒法師追隨太虛大師改革志業的實際作為」的表現狀況，根據印順長老所述：

### （前略）

廿二年，小住潮汕。冬，還武院，主編海潮音，鼓吹人間佛教。

翌年，講地藏本願經於漢口正信會；蓋法師於地藏悲願，景仰彌深。

廿四年，去日本考察佛教，備受彼邦佛徒歡迎。

廿五年，住持淮陰覺津寺，革弊建新，且將追闡院之盛！辦覺津佛學院，覺津月刊；主持七縣僧眾救護訓練；講學於感化院。護教救國，頗為地方當局所重。迨戰火逼近，法師乃退而自修。

後嘗主持高郵善因寺，時值戰亂，隨緣而已。抗戰勝利，法師出任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秘書長職。

卅五年，繼虛大師主持奉化雪竇寺。翌春，虛大師圓寂於滬濱，法師悲痛無已！其後，太虛全書之編撰，太虛舍利塔之建築，並多得其力。……<sup>2</sup>

在這一精練而準確的「行狀」介紹中，縱使對於現代中國佛教史所知不多的讀者，也可以了解，「太虛流新僧」大醒法師，是一直追隨太虛大師的改革事業的，有時成為代理人，有時成為接棒者，以及成為主要協同推動者，以及繼承並順利處理太虛大師死後的各種善後問題。

但，其中，他最具經驗與績效的是：有關佛學院的教務、住持佛寺革新、協助地方政府訓練抗戰期間的僧侶救護隊、負責中國佛教會組織的再造事務、創辦或主編佛教刊物，用來宣傳「太虛流新僧」的改革核心理念

：「人間佛教」思想。特別是最後一點，對當代盛行的「人間佛教」來說，更是具有指引的先驅者的時代深刻意義。

所以，本文開頭就稱他為「現代中國佛教改革健將」，可為名副其實。他是典型的「太虛流新僧」也無問題。

只是有關他在大陸時期的那些輝煌成績，本文限於篇幅，無法細說，而在底下一章，須要轉至本文的主題：他在風城的三年記事。根據印順長老所述：

#### （前略）

卅七年，復主編海潮音。

嗣以戰火南侵，乃奉潮音來臺灣；因任善導寺導師。歷年憂勞，血壓甚高。

卅九年，移住新竹之香山。

四十年，復發起主辦佛教講習所於新竹之靈隱寺，雖才財兩難，而足能勉成之。冬以腦溢血臥疾，纏綿及載，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乃別人寰、時年五十有三。<sup>3</sup>

但其所述這些來臺因緣與在臺三年相關事蹟，正如本文在前言已提過的那樣，並非只是停留在新竹，而是包括他在臺北善導寺的活動狀況在內。所以，在下一章

的敘述焦點，就是繼續完整敘述：

- (一) 來臺初期活動事蹟。
- (二) 從養病、治病到死亡相關歷程。
- (三) 從隨緣塔到福慧塔院。
- (四) 《大醒法師遺集》的編輯與出版。
- (五) 「臺灣佛教馬丁路德」VS.「太虛流新僧」的真相。

### 三、避難海隅與埋骨風城的相關經過

#### (一) 來臺初期活動事蹟

1. 新僧大醒法師來臺：其實是在情勢所逼下的不得已抉擇

佛光山星雲法師說：「在諸多大陸來臺的長老法師中，第一個到達臺灣的，應該要算大醒法師了」。「大醒法師到臺灣，應該與李子寬居士有關；李子老一生崇拜太虛大師，他只接受太虛大師，以及對太虛大師的學生信任之外，佛教界人士幾乎都不容易看在他的眼裡」。「在他接受臺北善導寺之後，那時正是一九四八年，大陸到處戰雲密布，所以他就邀請大醒法師把《海潮音》帶到臺灣發行」。<sup>4</sup>

但是，根據楊書濠博士的精細比對資料之後，發現如下的事實：「戰後百業凋敝，加之國共內戰加劇，出版事業也深受嚴重的影響，上海一地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已見若干雜誌、新聞報紙停刊。大醒法師原本想要找尋新任主任編輯的心願，也因局勢的動盪而無法如願。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大醒法師先行來臺，並在臺灣編輯海刊三期」。<sup>5</sup>然而，大醒法師實際來臺時間，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底，所以他不能算是最早來的。

不過，大醒法師會來臺灣，的確也與李子寬合資買下臺北名利善導寺有關，因而他才力邀「太虛流新僧」大醒法師來臺發展。編輯《大醒法師遺著》的幻生法師，之後從皈依大醒法師的在臺女信徒口中，也證實了這一點。<sup>6</sup>

但楊書濠博士，也未解釋「局勢的動盪而無法如願」的歷史具體真相為何？事實上，大醒法師來臺是非常萬不得已的。

因在他來臺之前三個多月，關係國共內戰勝負最決定性「徐蚌會戰」（中共稱「淮海戰役」），已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結束。<sup>7</sup>緊接著，四月間的「渡江戰役」，國共兩軍已在激烈交鋒中。<sup>8</sup>而一向與當權派蔣氏親近的「太虛流新僧」，除非先逃到香港暫時安頓

，否則就只能在投共、死亡與渡臺反共之間，三者擇一。所以大醒法師之所以最終選擇來臺，其實是情勢所逼，別無他途可走之下，才投靠在臺已有佛寺據點的李子寬居士。但也從此陷入一條充滿波折與絕望並最終埋骨風城的不歸路！

## 2. 重新解讀李子寬居士的在臺角色<sup>9</sup>

在慈怡法師主編，《佛光大辭典》的「李子寬」條目，是如此簡潔介紹的：

（一八八二～一九七三）湖北應城人。名基鴻。法名了空。為太虛大師之在家弟子。畢生於黨國貢獻甚大。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膺選為國民大會代表。曾連任漢口佛教正信會會長十五年，並任武昌佛學院院護、漢藏教理院院董、世界佛學苑董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輔助太虛、章嘉二師整理佛教事務。

氏一生誓願弘深，對太虛大師之弘法護持最力。太虛大師入寂後，負責推動佛教文化社、海潮音雜誌、太虛大師全書之發行等工作。抵臺後，以臺北善導寺為其弘法事業之主要道場，並多方扶持中國佛教會，為民國

四、五十年代之臺灣佛教界名人。著有《聖揆錄》、《百年一夢記》等書傳世。<sup>10</sup>

但是，如用來他與大醒法師在一九二七年，於福建廈門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與大醒法師結識算起，<sup>11</sup>他與大醒法師所擔任的有關太虛大師交辦佛教改革事務、乃至太虛大師死後的一切善後問題，兩者幾乎是長期重疊的。但，來臺後的李子寬與大醒在大陸時期的佛教權力相互關係，完全顛倒。

因為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李子寬，更被國民黨中央組工會所倚重，執行其藉「中國佛教會」在臺組織系統，掌控全體僧尼動態情資的工作。換言之，徹底國民黨化的「中國佛教會」在臺組織、以及掌控全體僧尼動態情資的日常運作等各項工作，李子寬幾乎就是上承下接相關任務的主要人物之一。

另外，包括僧尼來臺的入境許可、離境許可、組織動態、黨化宣傳、辦佛學院或辦佛教刊物許可，也幾乎都可以透過李子寬這位黨部的忠實黨務工作人員來轉達。連帶地他也可能有從中私下運作特權，來替自己謀利的彈性空間。

所以，大醒法師來臺後，只剩他的「太虛流」重要夥伴僧侶身份、相關佛教學養（如擔任善導寺導師之一

）、教務與寺務的出色經驗（如在一九五一年，參與主持在善導寺啓建的大型「仁王護國法會」活動）之外，就完全被他困住了。

特別是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蒙古籍的章嘉活佛（一八九一—一九五七），從四川成都匆促飛來臺北之後，大醒法師在「中國佛教會」的殘餘影響力，就被實際擔任第一任「理事長」的章嘉活佛所取代了。從此與章嘉活佛加強關係甚至利用章嘉活佛替自己謀利，甚至可能成為李子寬主要的工作重點對象。

換言之，大醒法師來臺，對他來說，起初只是作為在以僧侶為主佛教組織中，可以實質有助於他拉幫結伙的有力教界人士，以及能提供有用佛教人力資源，好讓他運用的「工具」而已。所以，當大醒法師的高血壓沒有嚴重到無法正常行動時，他就是被李子寬役使的「佛教黨化權力工具」，否則就是不堪再多關注的佛教工具，可以另外找合適者取代他。

這樣可以解釋，為何他對於大醒法師的高血壓病重後的相關治療問題，會根本視若無睹，宛如陌路過客。<sup>12</sup>連大醒法師過世後的一切善後，他也沒有接手處理。因為他立刻找到同為「太虛流」的著名僧侶：演培法師與印順導師兩者，相繼從彼等逃亡暫居地香港來臺，

無縫接軌大醒法師的高血壓病重後，所留下的教務與寺務的相關空缺。

但，因演培法師與印順法師相繼來臺後，一直到李子寬死後（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都活得好好的。所以彼等與李子寬之間必然萌生僧俗之爭的激烈化，就成為無可避免的惡性循環。<sup>13</sup>不過，這已不在本文處理範圍，在此可以省略。

## （二）從養病、治病到死亡相關歷程

有關大醒法師來臺前後數年，從養病、治病到死亡相關歷程，有新銳佛教史學者楊書濠博士，根據大醒法師來臺前後數年，刊載在《海潮音》上的相關編務記事，所撰寫的精彩論文「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的發展——以在臺復刊後的《海潮音》月刊為主（一九四九—二〇一〇）」，讓我們現在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到：

大醒法師來臺第一年，高血壓轉趨嚴重的原因有二：一是印刷所需的紙張，因物價飄漲，所以導致現有週轉資金不足，無法按期準時出刊。二是他一人獨挑編務大樑的過度勞累，導致身體健康難以維持。<sup>14</sup>

但在大醒法師來臺前後數年，從養病、治病到死亡相關歷程中，不論是在第一次發病後，或是第二次發病



後，所有生病中的照顧，並非李子寬或善導寺派人照料，反而都是全仰賴靠一位原信仰一貫道的道親賈懷謙（大醒法師來臺在善導寺當導師，演講佛法之後，也在場聽講的賈懷謙，從此放棄的信仰，皈依大醒法師成為在家居士）所照顧。<sup>15</sup>

再者，大醒法師的第二次致病，也是無可奈何中的意外。根據佛光山星雲法師的親歷敘述，即詳盡的提到：「……其實，大醒法師一生最不喜歡做經懺佛事，但是在這種因緣關係之下，他也不得不歡喜接受。就把講習會裡一、二十位大陸來的青年，一起帶到觀音山做了三天法會。聽說事後經國先生還包了一個大紅包給大醒法師，因為在大陸上做經懺，一向誦經以後，都會有嚟錢（紅包）供養。大醒法師就和大家說：『這些錢我們就不必分了，把它做為講習會的基金。』我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有人不以為然。不過，這也難怪，那時候大家都窮，都沒有錢」。<sup>16</sup>

「大醒法師非常氣憤，很不以為然，認為大家應該要發心，要為了佛教，所以就集合大家訓話。他站在講臺上，手拿粉筆，想要在黑板上寫『三皈依』，當寫第一個『自』的時候，手就停在那裡，拿不下來，中風了。停頓了很久，大家趕快趨前去扶他時，他就倒下來了

。大醒法師曾經跟我講過，他知道自己會中風，他說：『我身上有一顆藥，假如我中風的時候，要趕快把那一顆藥給我吃下去。』大概就是可以即刻往生。為什麼呢？他也曾告訴我：『我一生英雄，我可不能中風以後做狗熊。』」<sup>17</sup>

「但是那個時候，一群學生誰敢拿那一顆藥給他吃呢？大家忙著趕快把他送去就醫搶救。只是後來還是嚴重到不能講話，甚至癱瘓，呈現半植物人的狀態，從此以後就靠著他的在家弟子賈懷謙照顧」。<sup>18</sup>

「這一位賈居士真是菩薩，比兒女都孝順，侍候大醒法師一、二年有餘，直到往生。大醒法師圓寂時，才只有五十三歲」。<sup>19</sup>

反之，邀請他來臺灣當善導寺導師之一的李子寬，當大醒法師的高血壓沒有嚴重到無法正常行動時，他對於大醒法師的高血壓病重後的相關治療問題，會根本視若無睹，宛如陌路過客。<sup>20</sup>

當時，大醒法師被住院治療的「臺北鐵路醫院」，認為已難以改善病情，而將其強迫出院時，大醒法師回到善導寺的情況，是在無法自理尿尿的髒臭狀況下，被寺方草草安置的。

若非工友老杜、賈懷謙居士負責，或雇人照料，或

請皈依大醒法師的女居士捐款協助開銷，否則很難想像那是怎樣既悲慘又無助的生命末期煉獄？

所以大醒法師的死，除少數教界人士與學員或信徒，略有照應之外，沒有任何他作為教界改革健將與佛學院教育最具經驗者的應有尊嚴。

（未完待續）

## 註釋：

1. 編註：本文為作者個人研究論述與見解，不代表本社立場。

2. 印順，「行狀」，收在大醒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大醒法師著，《大醒法師遺著》，序文。

3. 印順，「行狀」，收在大醒法師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大醒法師著，《大醒法師遺著》，序文。

4. 星雲，《參學瑣談：憶大醒法師》，人間佛教通訊社，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5. 見楊書濠，「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的發展——以在臺復刊後的《海潮音》月刊為主（一九四九—二〇一〇）」，

《佛教圖書館館刊》，第五十五期（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6. 見幻生，「從認識大醒法師說起」，沈九成主編，《內明》六十九期，頁二十二—二十四。

7. 按：「徐蚌會戰」（中共稱「淮海戰役」），是第二

次國共內戰中的「三大戰役」之一，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攻中華民國國軍徐州剿匪總司令部防區。時間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開始，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結束。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此一戰役歷時六十五天，解放軍殲滅國軍五個兵團和一個綏靖區部隊，計二十二個軍五十六個師，共五十五萬五千人（其中俘虜三十二萬餘人，斃傷十七萬餘人，投降三萬五千餘人，改編二萬八千人；國軍將領被俘一二四人，陣亡六人，投降二十二二人，叛變八人。被消滅國軍統計中還不包括潰散和逃亡人數），此外還擊退由蚌埠方面屢次北援之第六、八兩個兵團。國軍方面，由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劉峙及副總司令杜聿明指揮，造成解放軍傷亡十三萬四千人。此戰役被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方面稱為「徐蚌會戰」（徐州、蚌埠），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稱為「淮海戰役」（淮陰、海州）。見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Wikipedia zh.wikipedia.org](http://Wikipedia.zh.wikipedia.org)、zh-tw，「徐蚌會戰」條目。

8. 渡江戰役又稱京滬杭戰役，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為攻下當時中國經濟最為繁榮、人口最為稠密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日期間，強渡長江，向中華民國國軍發起大規模戰略進攻的戰役。最終，解放軍佔領中

華民國首都南京、全國經濟中心上海，及杭州、武漢等大城市，並快速向南方推進。見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Wikipedia zh.wikipedia.org/zh-tw](http://Wikipedia.zh.wikipedia.org/zh-tw)，「渡江戰役」條目。

9. 本節主要的參考資料是：陳雯宜，〈試論佛教居士李子寬進入中國佛教會領導圈之因〉，《中正歷史學刊》，十六期（嘉義，二〇一三），頁八十七—一〇七。吳國展，「李子寬與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一九四五—一九七二）」（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班碩士論文，二〇一六年）。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新竹縣：正聞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新版一刷）。演培，〈一個凡愚僧的自白〉（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賈懷謙，「從得病到圓寂」，沈九成主編，《內明》（香港新界：第六十九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李子寬，《百年一夢記》（臺北：手稿本，一九七〇年）。朱鏡宙，《夢痕記》（臺北縣：文海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于凌波，「近代佛教大護法李子寬」，《近代佛門人物誌（二）》（臺北：慧炬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于凌波，「把《海潮音》遷至臺灣的釋大醒（一八九九—一九五二）」，《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三）》（臺北：慧炬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10.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頁二九五七。

11. 根據近人的研究：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蔣中正率軍北伐，任蔣作賓為湖北招討使，李子寬為政治部主任。李氏成功招降守將劉佐龍，收復武漢，並任湖北省財務委員會秘書長。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後又受蔣之命，擔任福建省財政廳廳長。某日閑遊福州鼓山湧泉寺，巧遇太虛大師，太虛大師為保護寺廟免遭共產黨毀壞而向李氏請命，李氏亦請福建省軍政當局出示保護全省寺廟，此為李子寬首次順太虛大師意旨行事。見吳國展，〈李子寬與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一九四五—一九七三）〉（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班碩士論文，二〇一六年），頁二十三。至於李子寬與大醒的結識，則是因當時大醒任教「閩南佛學院」，並擔任南普陀寺的「監院」之後。而當時，李子寬又因正擔任：福建省財政廳廳長、財政部禁煙處長、淮北鹽運副使三項要職，責任重大，又怕有閃失，所以前往南普陀寺請教大醒如何妥善處理？大醒提供他一些建議。於是兩人開始有交往。
12. 見幻生，「從認識大醒法師說起」，沈九成主編，《內明》六十九期，頁二十二—二十三。
13. 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新竹縣：正聞出版社，二〇〇五年，新版一刷）。演培，〈一個凡愚僧的自白〉（臺北：正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14. 楊書濠在「戰後臺灣佛教雜誌的發展——以在臺復刊後的《海潮音》月刊為主（一九四九—二〇一〇）」，〈佛教圖書館館刊〉，第五十五期（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文，提到：「海刊從第三十卷（一九四九）第五期起，即遷移臺灣印刷出版，發行部方面的事務與編輯部事務，在同一處辦公，完全由大醒法師負責。然而在匆忙倉促間遷臺，發行物件除了訂戶名冊外，費用、物資（先在上海購買的白報紙）等均來不及攜帶，來臺後就面臨無法發行出刊的窘境。」

「為了維持海刊在臺的發行，大醒法師向孫張清揚居士商借了舊臺幣一千一百萬元，作為維持海刊發行的基金，此項借款費用，後來得到了空居士捐五百萬、侯慧玉居士捐一百萬、李慈蓮居士捐二百萬，以及許多善信知識的代募或自捐才得以還清。有了此筆基金的支持，海刊才可以繼續在臺延續慧命。」

「至於此筆基金在海刊發行業務上的運用，大醒法師在找定印刷所後，會先給付印刷費若干，再以此基金充作預付款項，與印刷所簽訂印刷契約；印刷所在代印海刊的期間，能夠拿到此筆基金的利息，充當不足額的印刷費用，契約到期後，印刷所再退還此筆基金。」

「以此克難的發行方法，海刊與印刷所簽訂了八期的合約，順利完成第三十卷（一九四九）在臺的印製與發行

。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政府發行新臺幣，舊臺幣被以四萬元兌換一元新臺幣，海刊以新臺幣二千五百元作為預付金，與印刷所簽訂了四期的印製契約，完成第三十一卷（一九五〇）的發行出版工作。本年度的發行出版工作讓大醒法師心力交瘁，挫折感甚深，發行經費的短缺與印製費用的高漲當然是其困擾的一個因素，在第三十一卷第一期時即有提到：『臺灣的印刷費特別高，現在的印費較八個月以前，增加到十倍以上。』

「也因此深具編輯經驗的大醒法師不禁特別感嘆：『從三十七年二十九卷編本刊起，我才開始覺得，我的能力——什麼都不夠！』十五六年前，我的膽子很大，自信力強，認為我主編一個雜誌，這點力量還能勝任，：誰知到了十五年以後的前年，再來主編本刊時，才深知慚愧，覺得我雖具有佛教服務的一顆熱騰騰的願心，但檢討自己的力量實在什麼都不夠！」

「海刊自第三十二卷（一九五一）起，原為月刊發行改為季刊，表面上是為了響應政府反共抗俄『戰時節約紙張』的政策，縮短了編輯的篇幅；實際上，主因還是經費的考量，為了保持發行基金，以及避免再勞動道友們募緣，因此海刊與印刷所簽定印製四期契約，改為季刊發行，預定發行時間為一年。然而第三十三卷（一九五二）仍然維持季刊的型態發行，主要的原因與主

編的健康有關，由於大醒法師高血壓疾病纏身，至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時，已累到臥病在床，再也無法進行繁重的編輯工作，在接續主任編輯人選未能確定前，海刊只能維持季刊的方式發行」。

15. 見賈懷謙，「從得病到圓寂」，沈九成主編，《內明》，香港新界：第六十九期，三十一—三十四頁。以及同期，印海，「大醒法師示寂的前後寫實」，沈九成主編，《內明》，頁二十九—三十之文。

16. 星雲，《參學瑣談：憶大醒法師》，人間佛教通訊社，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17. 星雲，《參學瑣談：憶大醒法師》，人間佛教通訊社，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18. 星雲，《參學瑣談：憶大醒法師》，人間佛教通訊社，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19. 星雲，《參學瑣談：憶大醒法師》，人間佛教通訊社，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20. 賈懷謙，「從得病到圓寂」，沈九成主編，《內明》，頁三十一—三十四。

## 福智佛教基金會於北車舉辦音樂會為無家者送暖

財團法人台北市福智佛教基金會與時大音樂合作，於一月七日晚間，在臺北車站南二門前廣場舉辦「心光讚頌寒冬送暖心靈饗宴」，由一群視障音樂表演者，透由樂器演奏、獨唱、合唱等表演形式，傳送祝福予同為社會弱勢的無家者。

此次的視障音樂表演者，是基金會「心光廣論班」的成員，於班中學習《菩提道次第廣論》「心光」意指雖然眼睛看不到，但是內心是可以得到光明的，期望透過心光讚頌音樂饗宴的演繹，撫慰無家者的心靈。

臺北市社會局局長周榆修肯定視障朋友突破自身限制關懷他人的善行之舉，到場致詞時有感於臺灣近日的疫情發展，特別關心無家者的防疫問題，也向福智佛教基金會表達感謝之意。基金會執行長胡克勤特別說明這群視障朋友是從內心綻放光明，邀請大家也用心感受。活動現場邀請約兩百位長期在臺北車站週圍生活的無家者參與，福智義工也以中正社福中心為平台，協助發送各界的愛心物資：暖暖包、口罩、八寶粥、花生湯、便利商店商品券等。福智佛教基金會盼能在寒冬的夜裡，安撫無家者的心靈，也為社會角落注入溫暖的正面力量。